

中国古代
民族诗论

诗
论

祝
注
先
著



中国古代民族诗论

祝注先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族诗论

祝注先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1.75 印张 插页 2 256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8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710 册

ISBN 7-219-01309-4 / I · 375 定价: 4.25 元

目 录

序.....	李元洛 (1)
民族文学融合历史面面观.....	(5)
《越人歌》——壮族先民的古老情歌.....	(21)
附：旖旎缠绵 婉至动人	
——读《越人歌》.....	(33)
一曲悯惜悲怆的民歌——《匈奴歌》.....	(38)
白狼王唐菆的颂诗——《柘都夷歌》.....	(43)
附：读《柘都夷歌》札记.....	(48)
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	(57)
十六国时代诗坛沙漠中的绿叶.....	(71)
北朝时代鲜卑族的文学建树.....	(91)
盛况空前的唐代少数民族文学.....	(111)
辽代契丹族的词章翰墨.....	(143)
金代女真族的高才雅士.....	(161)
元好问的诗作和诗学理论.....	(178)
元代散曲中的少数民族创作.....	(207)
异彩纷呈的元代少数民族诗歌.....	(224)

明代回族诗人丁鹤年.....	(243)
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	
及其木氏家族诗人群.....	(250)
明代土家族诗人田九龄.....	(264)
容美洞主田舜年及其他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释疑.....	(281)
论纳兰性德的思想发展.....	(296)
论纳兰性德的爱情词.....	(313)
“一身归朔漠 数代靖兵戎”——历代	
少数民族诗人歌唱的王昭君.....	(332)
论“竹枝词”.....	(344)
色目人辛文房的断代诗人词典	
——《唐才子传》.....	(360)
后记.....	(370)

拓荒者的耕耘

——读祝注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论集》

李元洛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片广阔而丰饶的疆土，当代许多研究者在其间日复一日地寻幽探胜，年复一年地心织笔耕，刮垢磨光，昔日的珍宝在现代的阳光下闪耀着新的光彩，青枝绿叶，他的生命之树上也结满累累的果实。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论集》就是祝注先几年来奋力耕耘的收获。

在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片疆土上，有的是研究者密集的领域。如诗经以来的历代诗歌，如六朝的志怪和唐人的传奇，如明清的戏剧与小说，如中国历代的文学批评等等，有心人纷至沓来，熙熙攘攘，逐渐把生地翻成了熟土。唐诗与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更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处所，如同西方研究莎士比亚成为“莎学”一样，中国研究《红楼梦》也早已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研究《红楼梦》的文学与专著，其篇幅究竟是原著的多少倍，恐怕要请数学家来详细统计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当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远远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德国诗人歌德撰文评论莎士比

亚·就曾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为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说不尽的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群中，祝注先的特殊之处，就是由于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需要，他没有到人声鼎沸的地方去凑热闹，而是选择了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方位与角落，却又是必须开垦的天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去从事拓荒者的耕耘。几年来，他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辑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论集》中的约有二十多篇，共二十余万字，就是他的部分成果的展示。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今天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其中仍然有不少有待填补的空白，因此，对祝注先的这部论集虽然不能夸大其辞地说成是什么开山之作，但认为它具有填补某种空白的意义，对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开创性，恐怕是不能被视为溢美之辞吧。

辛勤的耕耘，并不能绝对保证一定有丰硕的收成，其中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是，祝注先的这部论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性或者说学术价值，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二十多篇文章，林林总总，既有宏观的理论的概括与阐述，也有微观的个别诗人诗作的具体分析，史实的考察、理性的概括和具体的艺术分析，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史、论、析兼备，读者就可以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发展的历史有轮廓式的了解，也可以对一些诗人及其作品有具体入微的认识。论集的第一篇，即是标题为“文学融合历史面面观”的长文，此文原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6期，作者从五个方面论证中国各民族文学融合的历史及其内在规律，涉猎典籍广博，援引资料翔实，史论结合得体，阐述明晰精当，其间不乏作者的独创之见。对于整部论集，此文有高屋建瓴之势，可以说是一篇导诗式的文章。《十六国时代诗坛

沙漠中的绿叶》一文，是一篇万字以上的宏文，既有对十六国时代少数民族的诗人和诗作的鸟瞰式的描画，也有对重要诗人诗作的开掘式的分析，同时，还有对个别有争议的作品考证与析疑，如果没有扎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以及诗学等方面的准备与功力，要写出此等文章是不可想象的，我虽然也算是专攻诗歌批评与诗论研究，但如果有试官要以这一题目命我作文，我大概只能交上一份张铁生式的白卷。祝注先这个集子的殿后之作是《论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这不算一个陌生的论题，虽不能说“前人之述备矣”，但要有所创获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艺术固然是对困难的征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治学不也是对困难的征服吗？祝注先此文仍然有自己的艺术感受与学术发现，特别是他将李贺与纳兰性德相比较，虽然还来不及展开，但片羽吉光，却也弥足珍贵了。

一提到学术论文，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仿佛就是枯燥无味的高头讲章的同义语，其实不然，好的学术论文固然要求有理论的深度与创造性的见解，固然主要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它也绝不排斥适度的文采。借用接受美学的观点，好的学术论文也要讲究本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让读者和作者一起积极参与学术的探索与创造。祝注先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论集》，虽然免不了历史背景的说明与史实的考证，但其中的文章并无平板枯涩之弊，而有流畅活泼之姿，读来引人入胜。这是因为祝注先年轻时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爱好者，现在虽然“嗜古”，当年却颇“喜新”，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新诗作品，有新文学的功底，手握一支年少时讨来至今在梦中也没有归还的彩笔，难怪他的学术文章也颇有灵气与文气了。

注先刚过弱冠之年，就碰到195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从此沉沦于江湖。新时期开始，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终于获得了第二次青春，专心致志于辞书学的研究。他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从1980年至今，连续八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聘为“特约撰稿人”。四年前，由于种种原因他又去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这块土地上拓荒，正如他在《自嘲》一诗中所说：“不学不才伤笨拙，可人可意少思筹。一窗寒暑延长夜，万卷晨昏到白头。”皇天不负苦心人，土地也不负辛勤的耕耘者，短短几年，注先就已经有了可观的收成，当他的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我特为之作序，权当燃放一挂表示庆贺的鞭炮。

1988年3月24日于长沙

民族文学融合历史面面观

—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我们这一片富饶而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中华民族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着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它是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个民族的统称。列宁说得好：“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①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既然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所难免，那么，由此而导致的民族融合，也就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了。

民族间的交往是通向融合的契机。且不要说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即在原始公社制的部落之间，据考古研究，亦显现出奇迹般的图景。

在中国境内，除了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外，还有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的百越文化、沿东北至西北迄西南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以及其它系统的新石器文化——这些大抵都是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原始公社制后期的遗存。令人惊异的是：在各种文化系统的接合部，其遗物遗迹反映出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系统的混合色彩。毫无疑问，这是不同血统的氏族人群曾经有过某种形式的平等交往或联合的结果。先进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诸多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对其它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推动力量。远古时代尚且如此，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②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族称：在殷商奴隶主国家内，包括有周、羌、蜀、人方、土方等族，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伐纣，除了周人以外，还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参加。此后，这些民族逐渐融合到当时的华夏族或其他族类的人群中去了。汉王朝建立以后，华夏族又与一些民族融合，国威日盛，声名远播。不过“汉族”其名，大概出现于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南北朝。从十六国到南北朝，一度在中原建国、雄踞一方的所谓“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除了“羌”以外，当今都已不存在，自然不能据此理解为他们已在中华民族的细胞中彻底消失。五代十国时期，突厥族沙陀部贵族据燕云十六州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长期与两宋对峙的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分别建立了辽朝和金朝，当他们的统治被摧毁以后，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没有回到故土。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将全国民族分成四等，整个北中国的人就都被视作“汉人”了。元朝统治者蒙古贵族垮台以后，散布在各地的蒙古人未得北归，

大都就地融合于汉族的汪洋大海里。所以到明末，顾炎武说，山东的汉人，不少是女真人或蒙古人的后裔。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无可遏制的潮流。金代女真族统治者一再下令禁止女真人变用汉姓，改易汉装，甚至规定女真贵族必修女真字经书；清朝满族统治者也施用皇权，屡次颁诏禁止满洲人学汉人装束，禁止与汉人通婚，然而却全都无济于事。他们无法理解，在夺得天下的同时，即使是具有“花岗石堡垒”头脑的部族或民族，也会如同走进了“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③，必将把民族之间的种种障碍碾得粉碎。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民族融合的积极性倡导者和推行者。北魏孝文帝元宏就是一位才识卓异的典型代表。进入中原以后，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采取“拟则中国”、“遵循华俗”的政策。少数民族统治者既能维护汉文化封建道统，什么“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即使在南北对峙、政权分裂的条件下，在汉人心中也就逐渐淡漠乃至泯灭。在清代，象林则徐、丁汝昌，象曾国藩、李鸿章，他们都是汉人，可对王朝忠贞不二，披肝沥胆。自然，此中有着儒家君臣大义教育的思想影响，但同时也说明了民族意识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不占什么位置了。和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相比，简直天差地别。这正是民族关系从分化逐渐走向融合的结果。

自然也有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的。比如在女真人统治的金国，陆游有一首诗叙述朋友出使的所见：“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后来范成大使金，见闻信笔，写了一卷记事诗，在《真定舞》诗下加注说在女真人统治下的艺术表演“悉变中华”。在内地凉山地区，据有人研究，早在明初以来，即有

汉族融入于彝族的历史记载。虽然如此，在整个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是旁派支流而已，并不影响在中国大地上是以汉族为主体进行融合的衍化趋势。

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民族间的融合必然会在文学上引起变化，并逐渐融合一致；它是由简单到繁复，具有内在的传承递变的衍化经过。

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两千五百年以前的春秋时代。那时，诸侯之间有一种盟会形式，参加者本限于华夏族。有的非华夏族在争雄称霸的激烈角逐中也常跻身于这种盟会。《左传》里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吴国攻楚失败，报告晋国，同时邀约了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一起在“向”地相会，讨论再次进攻楚国的计划。戎子驹支也到了。诸侯们打算逮捕他，怀疑是他向楚国泄露了机密。范宣子严厉地数落了他一番，并且警告他明天不要参加盟会。驹支强力辩解：“……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并且表示不参加盟会，也没有什么值得发愁的。最有意思的是戎子驹支当即朗诵了《诗·小雅·青蝇》，痛斥小人进谗言。从戎子驹支赋《诗》，足见华夏文学对于其他民族所产生的影响之悠远与深刻。

宋人洪迈在《夷坚丙志》里说到一则笑话：“契丹小儿初读书，光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

笑，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王）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⑤透过“笑话”的表层，可以知道契丹人对于汉文学的向往和学习热切的精神。

满族没有文字之前，民间流行的祝词常用汉字记音。如：

阿穆巴摩，萨齐斐；图门、阿尼牙，德伊集密。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

据说译成汉语是：

既伐大木，烧亿万春。
巨室成，荷天恩！

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运用汉字记录民族语言的创作就更为普遍了。

据已知，清人李调元《粤风》就辑录了由东楼吴代、四明黄道分别收集的《徕歌》二十九首、《壮歌》八首。吴代的《徕人扇歌序》里说：“扇歌书于扇，赠所私者。白扇，一面花鸟一面歌，字如蝇头，其词借扇及扇面花鸟寓意。相连数十首，前后起止，皆有章法，有创作，有套本。”作品多属这么一类的情歌，具有一定的审美艺术价值；尤其难得的是，作为一部文化遗产，虽然如钟敬文先生在《粤风考释序》里所说只是属于“开荒性质的著作”，但却足可供人们领略壮族先民的生活风采。作品开了壮族民间文学见于书面文字的先河。

最古老的侗族诗歌《起源之歌》是一部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宏篇巨制。可是这么一部记述着侗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史诗，却是借助汉字记录侗音才得以保存流传的。

这些简单的融合现象，是文学交流以至实现融合的必要阶段，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三

语言的共同性是构成独立民族的要素之一。大约是中古时代以前，我国诸多民族都还没有文字。历史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几首少数民族译歌，在汉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从另外一个侧面，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文学融合的具有发轫意义的可贵信息。

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的《越人歌》要算最为古老了。歌词原作有汉字注音：

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 𪛗。州焉乎秦胥
胥，纍予乎昭澶秦踰 𪛗。悵随河湖。

译为汉语是：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谿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有人根据汉字上古音构拟和壮语对照，认定歌唱的越人是壮族先民；再从鄂君子皙的活动年代，可以推断作品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比屈原创作《离骚》要早一百多年。梁启超在《中国美文史稿》里说：“在中国上古找翻译的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况且还有钩辘舌的越语原文，我想总不是伪造。”

《荏都夷歌》是又一篇附有民族语言汉字记音的译作。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中期（约公元66年左右），益州刺史朱辅宣扬汉朝国威，招抚了邻近一百多个闭塞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如白狼、槃木等内附。当时白狼王唐菆最表亲善，写了一组三首对汉王朝的颂歌，即《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由田恭译出，送给皇帝。作品首见于班固等撰《东观汉记》。译作四言形式，共四十四句，属“郊庙歌辞”风格。内中“慕义向化”、“携负归仁”云云，反映出一种亲善和睦的民族关系。梁启超《中国古代之翻译文学》说作品是“古书中之纯粹翻译文学”，和《越人歌》一样，这“两篇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且“原文具传，尤难得”。

此外，尚有《匈奴歌》、《敕勒歌》这种属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名篇。作品通过汉文典籍才得以广泛流传。

如果说翻译文学只能说明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象《木兰诗》这样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胡汉交融的产物了。木兰的形象和性格，有着北方各族妇女强悍勇敢的典型意义。她们不怕困难，和男子一样能骑善射。作品用语尤具融合特色，“可汗大点兵”、“天子坐明堂”两句，明显地词兼胡汉。又“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开头六句，

和《折杨柳枝歌》差不多全同；《折杨柳枝歌》歌辞原出北国，是一首“胡歌”，而《木兰诗》却又属汉诗。所以《木兰诗》可说是文学融合的见证。

在满族民歌里，也有汉语中间夹杂着满语词汇的混合式歌谣。有一首民歌的结尾是这样的：“瞧完了亲家到我家，我家没有别的——达子饽饽就奶茶，烫你勾的小包牙！”^⑦毫无疑问，这类作品只能算是融合的雏形。

四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起着影响全局和推动全局作用的是华夏文化。但是，它的生命力却突出地表现在善于兼收并蓄、融解消化。“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⑧以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几种体裁为例：首先是乐府中的胡歌。

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养分之融入乐府，主要表现在“鼓吹曲辞”、“横吹曲辞”和“杂曲歌辞”。《汉书·叙传》云：“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这里说到了“鼓吹”传入之时间、由来以及流传的情况。

《汉鼓吹曲辞》之《饶歌十八曲》，除了《战城南》、《上邪》、《有所思》等篇可解者外，大都诘屈聱牙，甚或不知所云。清人陈沆等专心致力，勉为训诂，仍难通解，且余《石留》篇不提。这篇歌辞是：“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谿冷将风北逝肯无敢与于扬心邪怀兰志